

转变中的东亚地区秩序

王学玉 王永洁

摘要: 与国际安全的结构性变化相一致,地区化是当前东亚地区安全的基本特征。在东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安全秩序正在经历着从地区体系到地区社会的缓慢转变,即从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演变为一个东亚各国将地区安全界定为国家安全的保障、意识到并通过地区规范来管理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和规制互动关系的东亚社会。从长远来看,安全共同体是东亚地区的理想秩序,但它的实现有赖于地区社会的发展和培育。为此,必须通过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建设把安全与经济与社会间的联系结合起来,推动既为了安全、也为了福利目的的地区制度建设。安全制度化和地区一体化是稳定与和平的东亚地区秩序的两个支柱。

关键词: 东亚地区; 安全地区化; 地区秩序; 地区社会

国际安全结构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地区化,是当前国际政治安全走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国家安全环境与政策,国际冲突与危机管理,甚至是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中,地区范畴已成为一个最为现实和最有意义的聚焦点,因为这些问题越来越发生于地区框架与脉络内,受到地区特点、地区内互动、地区秩序和地区发展的过滤、折射和塑造。这决不意味着全球安全互动的框架与进程不再重要,而是它们的形成与特征、作用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在通过地区层面体现和发挥出来。东亚地区就是这种走势的反映之一。从安全政治关系的框架、脉络、角色、进程和后果来看,东亚地区安全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方程式,当然它也是在与全球、与外部力量的互动之中演进的。本文试图勾画出东亚地区安全地区化的表现以及地区化之后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特征,解析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和平转变的主要路径。

一、东亚安全的地区化

冷战体制瓦解后,世界安全的类型不断分散,不再有统一的全球逻辑,而且主要是以各个地区部分总和的面目表现出来。无论是合作与一体化加强型,还是冲突与分裂加剧型,多数的地区安全都呈现出了地区化的发展特征。东亚地区也不例外。在东亚地区,安全的地区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在地区内部。安全问题(安全或不安全)与安全环境,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反映,也是一种观念和认知的表达;既是一个由安全问题的本性与逻辑所决定的自动进程,也是国家或其它角色有意识的政策结果。从这些角度来看,当前东亚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由全球政治安全体系所导致,而是产生于它的地区结构、内部的互动、有关国家的观念与政策以及许多引发冲突的纠纷与事务。首先,东亚的安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政治结构的不稳定、不确定或不安全所造就的。在权力结构上,美国霸权的存在虽然在东亚地区政治转变时期有着稳定局势的作用,但霸权框架下权力的落差必然会带来威胁感;霸权国家的霸权维持战略、自行其是的行为信条和咄咄逼人的威慑手段,会降

收稿日期: 2009-10-26

作者简介: 王学玉,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济南 250100);王永洁,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低它以外交方式处理冲突的程度,增加了地区不安全的可能性。对美国可能在这个地区实践其“新帝国”情结的担忧、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对中国要成为何种国家和走向何处的疑虑,增加了地区内普遍不安全的感受;更重要的是某些大国以利益、安全与权力的排斥性来界定相互间的关系,制造出了不安全的地区环境。在制度结构上,由于美国奉行的是双边主义,并且尽量在地区内其它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中打入楔子,尽管它可能在有限的具体问题上主张多边合作(如目前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其结果是将这个地区置于以敌意与不和为特征的地区体系框架中,加重了国家间相互威胁和争端频仍的风险。在地区内的互动结构上,东亚地区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分化:经济的地区化与地区主义日益高涨,政治与安全的地区合作则是徘徊不前。缺乏政治合作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可能后果是,难以发挥出经济合作收益的政治社会聚合效应,反而加剧了随经济收益分配的不均衡而来的猜疑和恐惧,诱发出竞争和冲突等经济相互依存的消极意义。如果这种方程式不变,那么经济联系越是密切,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就越严峻。其次,被东亚国家列入重要安全议程之中的主要是地区内的各种安全问题。目前,全球性安全问题在东亚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并不是核心,即使是恐怖主义蔓延导致美国战略安排的调整;南亚和中亚等其它地区的安全事务对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即使是印度与巴基斯坦双方拥有了核武器。挑战它们的安全环境与政策的是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地区内的众多领土纠纷、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与先发制人的战略和主要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或不稳定。围绕着这些问题,东亚国家分别构筑起来了各自的安全战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安全政策和关系。再次,东亚国家也基本上是视地区内的国家为主要的安全威胁或对手,或者是在安全战略上隐含着敌视的政策和后果。美国与日本在各自的外交思维和安全战略中都是将中国作为假想敌,其它中小国家或明了或隐喻地在这三个国家间作出或朋友或敌人的判断。其实,多数东亚国家并不愿意进行这样的选择,不愿意看到这个地区因此而分裂,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大的威胁是地区内力量间的战争”。¹

第二,东亚安全的外在性主要是地区性的。安全的外在性,指的是一个国家、国家群体或组织的安全政策和举动所产生的成本(消极的外在性)与收益(积极的外在性)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国家或组织,其承受者会程度不同地扩散到其它的国家和社会。在由一个国家、群体或组织发起的某些安全政策与行动并不完全被另一个或一些国家所赞同时,安全的外在性便发生了。在此情形下,后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安全就会受到它们所不赞同的政策与行为的损害或保障。² 消极的安全外在性把相关的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了安全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具有全球安全外在性的冷战的瓦解并没有使外在性的全球性完全消失,但安全外在性的地理、尤其是近距离的属性正在日渐突出。东亚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外在性就是基本上产生于、并局限于地区内部,诸如缺乏共识和普遍接受的大国的军事与外交政策,美国与某些国家间的军事与安全同盟关系和地区战略,美国对东亚军事投入和战略投入的增加,不断被人鼓吹、有排斥性和针对性的各种可能形式的“东亚的北约”(如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抑或再加上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某些国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追求,在处理各种纠纷事务上的单边立场,以及某些东亚国家之间在同时进行中的国家建设进程与目标上的敌意和紧张,这些安全政策与举动都对另外的一些国家构成了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有的国家因此而受益。由于东亚国家间缺少有效的共识和制度,消极的外在性往往是过量和过重地产生,因为制造者既增加了自己的安全系数,又无需负担由此给整个地区社会带来的成本,甚至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积极的外在性却又是不足,因为制造者在为此支付较多安全成本的同时,无法获得所有可能的收益,或者是有能力控制这些收益的分配,别国则可以轻易地搭便车,包括它(或它们)所确认的竞争对手。因此在目前阶段,尽管东亚地区的共同安全利益是显著的,但消极的地区外在性却是越积越多。

第三,东亚安全事务基本上是由地区内的国家来处理、管理和解决。在一个相互渗透和不断全球化的世界中,外部力量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是不能排除的,甚至是有所加强的,但安全地区化意味着它们不会成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根本源泉。也就是说,作为安全地区化的一个标志,管理地区安全的制度结构应是呈水平状态(由地区内的国家来控制),而非等级制状态(由外部霸权国家与地区内国家的关系来

¹ Susan L. Shirk,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Balance of Power or Concert of Powers* in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² David A. Lak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 System Approach* in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决定)。目前对东亚地区安全事务的治理(处理、管理和解决),无论是力量制衡,非正式的多边协商,还是对合作型安全机制的探寻,都是以地区国家及其关系为主导的。尽管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参与东亚安全事务的兴趣很大,某些国家也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把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拉进来,但它们的作用都极为有限,联合国现阶段在此地区的活动空间也不大。作为“外来户”的美国已经开始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据其特征和需要调整它的目标、原则与政策。换言之,美国正在将自己设计和打扮成一个东亚国家。诚然,美国力图把对许多地区事务的参与作为其全球霸权努力的重要环节,但地区政治的逻辑与规则同全球政治毕竟有所不同,它在全球政治中的那种我行我素的风格并不能完全运用到所有的地区中去。因为在地区架构内,大国间力量与影响的差距要比在全球层面上小得多,而且成为一个地区国家也意味着要受制于比全球结构约束严格得多的地区脉络与体系,国家行为不可触犯的那些地区底线也是要高于全球政治的底线(如果有的话)。美国在东亚地区就是如此,当然它所遭遇的挑战远没有达到在欧洲地区所面临的程度。这是地区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东亚的安全复合体

在安全地区化形成之后,便会出现地区安全复合体。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复合体界定为地理上接近的一群国家之间形成了有重要影响和特征的安全联系,安全事务上有着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这种框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撇开其他国家来单独地考虑自己的安全利益与政策。它不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关系,也包含了地区内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等新的安全事务方面的关系。¹ 每个地区的安全问题都是由下列因素塑造出来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安全利益的分歧、角色的相异、特定的地区冲突和针对竞争对手而在国内和国家间建构起的各种安全制度,地区内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安全复合体囊括了地区内国家间从敌意不和到友善和睦的各种关系类型。根据地区内的国家与民众通过和平谈判而非强制威胁与武力,来解决它们的不同和治理它们的相互依存事务意愿的程度,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处理和安排至少有六种类型,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安全共同体、霸权共识的领导、多元的安全共同体、大国的协调、势力范围或霸权的强制领导、力量的制衡,它们分别体现出了不同的地区秩序。² 表明地区特性的安全关系一般是多样的,是多种类型的共存和结合。那么,东亚地区是一种什么样的安全复合体和秩序呢?从动态的角度看,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处于一个缓慢转变的过程中。转变的初始一端是我们目前所深刻经历和感受到的以冲突为主要组成方式的东亚安全体系,而逐步转向的另一端则是国家安全与地区安全都能得到较大程度保障的东亚地区社会。总体而言,在目前的东亚安全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得到较好构建的安全结构,来管理因力量变化和应对具体事务而出现的那些政策调整,地区形势和国家关系处于不确定和紧张的状态,零和思维是主导,安全机制和国家安全主要是由单个国家和/或者国家结盟的力量制衡政策所提供和保障。有三种动力构筑了这个体系:处于最高层面上的美国地区优势战略,地区内主要力量间的相互制衡以及较低程度上的大国协调,它们都是可以在现实主义理论的架构内得到解释的。美国的地区优势战略是在力保其东亚霸权地位的同时,遏制其它大国进行挑战的能力与可能性,实质上是超越、维持现状,扩大优势,确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以积极抑制可能的挑战者为目标东亚地区秩序。为了试图通过为东亚地区提供安全保障这个公共产品而获得“合法性”,这个战略先入之见地把中国视作地区现状的主要的挑战者和威胁,尽管很少有证据表明中国有这种意图,相反,中国既没有领土扩张的信条,在反对美国的联盟制度方面也是防守型的。”支撑美国这种优势或霸权战略的是其全球战略的向东亚倾斜、在这个地区众多的双边同盟或友好关系、稳定加强的前沿军事存在和东亚国家对其经济的依赖,而东亚国家间政治共同体建设的举步维艰、根深蒂固的历史怨恨和互不信任情绪的增长,则为此创造出了足够

¹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John H. Ikenberry et al. ed.,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² Edward A. Kolodziej, *Model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Roger E. Kanetkar ed., *Resolving Regional Conflict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³ 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的空间。

被作为美国优势战略的替代并具有很大实际影响的,是地区力量制衡和或者威胁制衡的安全模式。¹东亚地区力量和(或)威胁制衡体现在两个层面和形式上。

一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制衡。准确地讲,这种情势是美国为制约中国而生成的,它把中国界定为主要的对手和威胁之所在,中国正常的国力发展被视作威胁的积累,不相信中国对未来的外交政策所做出的承诺,因此它在这种关系中是积极和进攻性的,而中国则是被动和防守性的。由于美国利益需求与安全认知的矛盾,中美间的互动制衡始终摇摆于两个方向之间:随美国的接触战略而来的两国在地区外交与制度上的有限合作,这能够防止使“中国的威胁”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以及使东亚陷入两大对立的阵营;²随美国“缓和的遏制”(modified containment)而来的长期的战略上的竞争,美国无奈地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追求的利益和可能拥有的地区影响的合法性,但要遏制中国对它所谓的成为地区霸权的努力。当然中国也是以自身力量的增长和外交的灵活性消磨美国的霸权锐气,但它始终保持着理性,没有过重地陷入“行动—反应进程”这个很危险的逻辑。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对地区安全的威胁,它也构成了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的重要部分,制约了其它地区国家的外交与战略选择。

二是地区多边的制衡。多极化被认为在东亚最为现实或最有可能,也是许多国家的期望,中国、美国、日本和东盟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处于地区边沿上的俄罗斯与印度也程度不同地或主动或被邀请在东亚发挥影响,它是一个深受大国关系左右的地区。真正具有地区意义的是中日关系,它决定着东亚地区的地区性程度,但两国间竞争的需要与合作的需要处于胶着状态,在战略上前者明显处于上风,合作机制与渠道甚至少于中美之间。使双边关系及其地区影响更为复杂的是,除了兜售中国地区威胁论以及将其作为日美关系的核心动力,日本还常常有分化东盟和利用外部力量(如印度)来制约中国的举动,而且也是从相对所得的角度来考量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的价值。当前,东亚大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为权力与影响寻找“合法性”,但合法性既不是自封的,也不可能指望由其主要竞争者所赋予,只能来自于地区、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广泛承认或支持。东盟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力量,东亚大国都将其视为各自合法性以及在制衡关系中取得优势的主要资源,美国期望东盟国家成为其地区霸权的服从者,中国与日本都非常渴望东盟国家接受它们对地区的领导。换言之,离开了东盟国家的支持,这些大国的地区战略都难以实现。因此,即便是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贸易合作,近年来也成了它们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事务。东盟由此构成了东亚多边制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地区层面上,中小国家或组织能够起到大国的作用,这是地区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二。

力量与权力的非均衡和等级的存在、大国之间地区冲突与危机管理机制的匮乏、地区热点问题的高温不下、朋友与对手的泾渭分明和灵活性的缺失,使东亚的多极化不可能像19世纪的欧洲权力关系那样既保持相互间的相对稳定,又维持地区的和平秩序,因此单纯地追求东亚的多极化可能导致这个地区“更适宜于对抗”。³出于不同的考虑,地区大国在具体的地区问题上有时也做出了“特别的多边主义安排”,如从较早的柬埔寨和平进程,到近些年管理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包括许多非正式的多边交流和信任措施建设,如东北亚合作对话和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等。但是,这些国家既没有将它们战略思维、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搁置一边,也没有在地区秩序的类型上达成共识,积极地构建合作的制度平台,大国协调机制更多地只是体现于个例、外交姿态和对权力政治的补充。显然,基于上述动力所构筑起来的东亚安全体系,基本上反映出这个地区所处的无政府状态和传统的安全困境,地区安全是在霸权与大国间军事和政治僵局的权力制衡基础上维持的。

但这并非东亚安全复合体的全部。与无政府的安全体系截然不同的东亚地区社会属性近10余年来也

¹ Stephen Walt认为,如果把制衡行为作为一种对威胁的反应,它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Michael Mandelbaum在提出威胁制衡的逻辑时指出,国家在决定是否采取制衡政策时,要权衡的不仅是主导(或有可能主导的)国家的能力,还有它的意图。Michael Mandelbaum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1, 1997。由于临近国家间相互威胁的可能性最大,这样的心理和观念也最强,地区政治中的威胁制衡更为明显。

² Robert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No 2, 1997。

³ Michael Mandelbaum *Incomplete Hegemony and Security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in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逐渐地得到了塑造。在地区社会中,国家对共同利益的存在及其保护的必要性,安全与福利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有着共同的认可,意识到并通过地区合作创造出规范与机制来管理成员国间利益的冲突,以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地区制度组织或规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交流与互动。同时,不同的国家和力量能够并需要起到不同作用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被成员国所了解和接受。当然,东亚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区社会,但已经迈向了这种社会建设的道路。第一,东亚国家在地区安全规范上有了较为一致的优先考虑,如以防御而非侵略或占领邻国为军事能力发展的目标;¹为了降低各国所普遍面临的因国内和地区不稳定与威胁而来的脆弱性,必须重视通过地区非军事方面的努力来提供安全保障,要与盟国和潜在的对手建立起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以形成一个“两边下注的战略”(hedging strategy);²需要有地区的安全合作,而且在地区稳定、相互信任、反恐、反扩散、经济安全等合作的议程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反映出它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确立了共同的底线,对地区安全与集体安全有着共同的期望。第二,东亚国家在地区安全制度建设上有了一定的进展,主要途径是东盟地区论坛的外溢。东盟的政治安全规范(协商、灵活和政治意愿)是东亚安全多边主义的基础,“10+3”的多边对话为东亚安全合作确立起了制度框架,其宗旨也从传统的信任建设扩展到了预防危机。阿查亚(Amitav Acharya)指出,东盟地区论坛对地区秩序的意义远大于它对力量制衡机制的依附,眼前将通过为大国提供克制和信任建设的规范而有助于塑造力量制衡,未来甚至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超越力量制衡。”³第三,东亚经济的地区化程度不断加深,地区内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强,这不仅动摇了支撑主导东亚安全政治的结盟和合伙的理性,也使东亚国家有动力通过追求和加强多边制度,在增加地区财富、保证未来地区对重要能源需求的供应、扩展通讯网络方面加强合作,因为这样所有的国家都将比相互竞争和集团政治占主导状态得到更大的繁荣和更多的资源。⁴地区化也带动了东亚区域内各层面和各领域的往来,影响地区跨国关系的各种重要角色都卷入了一个密切的社会互动、交流和学习的进程,东亚地区主义日益高涨。地区化是东亚地区社会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显然,在目前的东亚安全复合体中,地区体系结构的属性(强调权力安排及其张力)仍然是主导,地区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但它已经拥有了基础,而且也是东亚各国和各阶层的共同愿望。地区体系向地区社会的发展,并不表明东亚国家对维护各自安全利益努力的下降,相反,是通过方式和观念上的改变来更好地谋求和确保国家安全。这就是,开始把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地区安全界定为国家的前提和保障,为了国家安全环境的稳定和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必须更多地关注地区的命运,为避免分裂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而实现地区的合作和制度化。

三、东亚地区秩序的和平转变

尽管人们常常把东亚地区最主要的威胁或不稳定归结于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力量之间的角力,但这个地区的现状终究是要发生变化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⁵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走向一个理想且可行的东亚地区秩序:国家合作、地区和平发展、谈判解决分歧;如何在通往理想秩序过程中和地区政治变革时不引发地区的动荡和不危及各国的安全目标与安全环境,也就是说,如何实现东亚地区秩序的和平转变。目前的美国地区霸权抑或许多人极力提倡的地区多极化,都只能是利用威慑来维护各方利益和维持和平,安全困境问题始终存在,而且它们都不存在实现秩序和平转变的机制。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目标应当是形成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即地区内的国家间养成和平互动的习惯,在解决相互间的分歧和地区事务时不

¹ Dennis Blair and John Hanley. From Wheels to Web: Reconstructing the East—Asia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1, 2001.

² 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 East Asia*. Routledge, 2001.

⁴ 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⁵ 中国往往被指责或被怀疑为最有动力试图改变东亚政治现状的国家,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江忆恩在考察了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取向与参与地区合作的努力后指出,这种看法和印象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2003. 也可见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11.

再期望、准备或者担心使用武力。¹ 东南亚次地区现在已经是一个这样的秩序。安全共同体是地区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安全、经济以地区整体性的面目实现紧密的连接,体现在一个既为了安全、也为了福利目的的地区制度建设中。因此,东亚地区走向安全共同体必须同时考虑两个因素:安全的制度化和经济的一体化。² 从历史上看,地区秩序实现根本转变的方式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前者发端于大国间力量对比与权力关系的短期内转变,以此带动地区社会、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后者则是通过广泛的地区经济、社会、规范和政治的结构性重建,使权力在此消彼长的同时能够相互容纳。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复杂性,和平转变的可能方式则是,一方面对地区内的力量关系与安全事务做出有利于地区整体性的安排;另一方面加快地区经济合作。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可以结合在同一个命题之中,即推动处于初始阶段的东亚地区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安全制度建设方面,首先,需要建立和加强东亚地区的信任措施,以摆脱对国家间互利目标的事实认知的障碍,并作为由地区体系过渡到地区社会的桥梁。东亚的不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猜疑、误解、互不信任等心理因素所导致。为此,要有一个地区整体的信任规划,将东盟地区论坛、各种形式的“第二轨道”联系和必要的非政府组织融合在一起,提出短期的和特定的目标,通过交流和谈判,达成一致,形成规范。信任是不断增值的,能够在国情和体制复杂多样的东亚国家间最终产生出政治的容纳。信任措施主要关注于安全意图而非能力,它不以各国的安全信条与军事结构的改变和相互妥协为前提,也不会损害各国的安全利益,因而可以为降低东亚政治的无政府性和处理盘根错节的安全关系提供最可行的突破口。想一想作为信任措施建设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组织)在冷战与欧洲巨变时期的作用,就可以理解这种制度对地区安全的意义。其次,要引入一种修正了的大国协调机制。大国协调机制既可确保大国自身的利益,又能够通过它们的协调解决地区冲突问题,但中小国家会被排除在影响它们的福利与安全的决策之外,不利于所有国家对地区整体安全建设的参与。为此,有积极意义的东亚大国协调机制应将东盟作为一个“大国”包容进来,增加中小国家的发言权,并赋予这种机制以合法性与权威。大国协调机制也要有一个从非正式到正式的发展过程,因为非正式的安排是东亚国家处理地区事务的重要规范,特别是非正式的政策调整将进程与本质或结果同等重视,而且它们对非正式的合作也有着丰富的经验。需要强调东亚大国协调机制的两个主要支柱,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地区主义,尽管竞争与对抗依存,但日益强盛的地区主义可以将大国结合在一起,使相互间的理解有着更好的基础;二是对现状的普遍承认,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地区争端与地区地位问题。再次,要追求以安全多边主义为基础地区安全体制。东亚国家的不安全感产生于相互间意图的不确定,对这种不安的舒缓方法便是确立具有地区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坚信安全成本与收益的不可分离,促进地区整体和长期的安全互惠预期,这有利于为地区战略安全提供集体或公共产品。据东亚地区的现状,第一步应是正式程度和约束力较低的地区合作安全。合作安全着眼于规制各国的军事能力及其实践,即形成限制各国进攻性和防御性军事力量的地区规则,确保相互间在安全与军事政策上的透明,采取联合的地区和平维持活动。这种体制并不包含对防御任何成员国遭受其他成员国或第三方力量军事打击的承诺,即通过集体行动防御侵略的法律责任,但提供了政治协商和军事合作的机会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推动地区集体安全制度的建设。集体安全体制关注的是管理地区内国家间的关系和预防冲突,成员国间对维持地区和平有着共同的关心,对地区和平的潜在或实际的威胁有着共识和一致的反应。

这些安全制度的建设有助于培植东亚国家的安全地区主义和地区安全认同,但要形成一个同质性的地区社会,还离不开地区经济的融合。地区一体化既是与地区内民众和政治家“我们”的感受程度有关的一种态度现象,也是一个创造或者积聚“我们”感受的态度变化的进程。地区一体化在地区层面上产生的制度与规范、在国家层面上产生的共同反应、在个人层面上产生的群体观念与认同,为安全共同体的构筑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东亚地区的一体化,目前已经进入了地区整合与政策会聚的阶段。目前东亚合作已经有了行动的框架,由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机制组成,合作进程也通过程度不同的东亚整体、

¹ 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² 有的学者也认为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未来应该是安全共同体,但他们根本不考虑地区经济合作因素的支撑作用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在军事安全方面甚至主张加强美国主导的双边结盟关系。见 Dennis Blair and John Hanley, *From Wheels to Web: Reconstructing the East-Asia Security Arrangemen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1, 2001.

东盟、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中日韩的合作形式发展起来。但地区一体化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轮子”整合为真正的地区网络、地区整体的统一架构。一是要进一步促进目前已达到较高程度的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地区流动,鼓励非官方经济部门地区活动的深入,形成一个将东亚国家各个层面和职能部门有机结合起来机制,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结构,增强地区合作的需求与动力。二是坚持东亚地区主义指导思想和多边与双边同时发展、互不排斥的原则,逐渐推动目前的多种地区合作形式的会聚。鉴于中日韩目前难以提供它们之间的一体化,最可行的就是通过东盟的地理“外溢”来吸收东北亚次地区。同时还应当注重部门职能的一体化,如金融、投资等。三是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努力建造东亚一体化的火车头或地区结构的脊梁。中日关系的紧张和地区战略的相左,被广泛认作是东亚一体化难以实现的主要症结所在。为此需要两国在历史问题以及对地区发展的责任问题上达成共识,将它们的国家建设视作相得益彰而非矛盾、甚至是敌对的努力,在手段与目标是相互容纳的,要有权力分享与合作领导的大国取向。中国要证明它的非霸权承诺,是地区秩序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力量;日本要放弃在不承认其历史污点的同时,又试图成为东亚领导者的这种“混过去”的实验,要对地区做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贡献。

安全制度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社会效应与意义,符合东亚国家“相互学习与适应”的价值传统,能够推动它们重新界定和解释地区现实——真实的、可能的或期望的,加强地区认同,增进管理、甚至是转变地区现实的能力与动机,这会构成地区变革的机制和社会结构,并使之制度化 and 持久化。总之,通过安全的直接手段与间接手段的结合,在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理性(legal-rational)的制度之外,生成出一种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的规范,即协商、共识与责任。如此启动起来的东亚地区社会发展并不会在某一点上停留下来,而是不断地积聚出地区共同体建设的热情,以满足成员国间安全与福利领域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的需要,否则,地区社会也不可能作为一个社会保存下来。¹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in Transition

WANG Xue-yu WANG Yong-j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 R. China)

Abstract Consistent with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onalization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The security order in East Asia is transiting from a regional system to a regional society, a transition from a typical anarchy to a society wherein all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dentify regional security with the guarante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alize the necessity to solv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regulate interrelations among one another through regional norms and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nforma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security community is the ideal order for East Asia in the long run, but its realization depends heavily on the nur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society. For this end, the pursuit of security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 aiming at greater security and enhanced regional welfare. Securit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re the two cornerstones for a stable and peaceful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Key words East Asian region; security regionalization; regional order; regional society

[责任编辑:李春明]

¹ Mohammed Ayoob, From Regional System to Regional Socie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3, 1999.